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近代史论](#) / [清代晚期](#) / [市场、金融、商品经济](#) / 晚清政府与近代中国首家银行的创立

晚清政府与近代中国首家银行的创立

2007-01-15 祁敬宇 作者投稿 点击: 1075

晚清政府与近代中国首家银行的创立

晚清政府与近代中国首家银行的创立

祁敬宇^[1]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晚清政府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过程,分析了晚清政府、洋务运动对通商银行的影响,以及金融业对一国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国通商银行; 晚清政府; 洋务运动; 银行业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倡议,经清政府批准,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经营存款、放款业务,发行银元券和银两券。

中国通商银行,由于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及其创办人盛宣怀的声望而为世所瞩目,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决定晚清政府成立的这样一家银行的命运,它没有避免清王朝灭亡的历史命运,也没有因它的建立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即那个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中国近代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正体现着这样的历史规律,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写照。

晚清政府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的缩影,世界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加紧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起伏、不断激化中成立、发展起来的。晚清政府对于中国通商银行的扶持是以巩固其统治为名的,始终难以摆脱支持、压制的徘徊局面,晚清政府无力担负起创建近代金融的使命。一个贫弱的国度是无力发展金融的。今天,在清王朝灭亡近百年和中国入世、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回顾近代中国首家银行的建立这段沧桑历史,个中滋味,令人重新读解。

一、通商银行成立前的中国金融概况

清政府统治中国经康乾盛世后,已趋没落,至嘉庆、道光年代内忧外患动摇着其统治,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帝国主义入侵,清王朝的金融业面临严重的挑战和危险。

清政府时期的金融机构,大体上以典当、钱庄、帐局、票号等组织机构的发展和活动居重要地位,在以银两和铜钱为市场通货的条件下,这些金融机构由于调拨资金之需要,促进了汇兑事业的发展。从有关资料上看,钱庄似早于票号,但二者究竟为何关系,尚不十分清楚。一般说来,钱庄与外国银行关系密切,而票号与清政府关系密切。自咸丰时起,清中央政府和各省设立的官银钱局号为解决财政支绌先后铸造大钱、铁钱、铅钱,发行官票、宝钞。清政府在咸丰三年(1853年)建议各省都设立官钱局,这些官营金融机构忽起忽落,昙花一现,但其作为清政府首先出现的官僚金融资本,对以后官僚金融资本的发展,对日后中国创立银行具有一定的影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响。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广大的市场令外国冒险家垂涎三尺。19世纪40年代在印度涌现出一批较小的英印合营银行，如呵加刺银行、印度西北银行、西印度银行等等。后由西印度银行改称的丽如银行于1845年同时在广州和香港设立机构，这是在中国设立的最早外国银行。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已有10家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而其中就有9家是英国的，但英帝国主义欲壑难填，要设立一个总行设在中国的殖民地银行(当时在中国的外国银行都是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分行设在中国)。于是，1865年3月3日，“香港上海银行”正式成立，中文名字为“汇丰银行”，意即“汇款丰富”，总行设在香港，同一天香港分行开始营业，4月3日上海分行开业。汇丰银行是中国近代史上从第一家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起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在帝国主义开设的数十家银行中势力最大的银行。这一阶段实际上是英国银行的独霸时期。

为了加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中国设立银行。在汇丰银行设立后又有美、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银行，尤其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外国银行数目在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之前，已达到20多家以上。自京津起，南临海口，东自上海，西达汉口、九江的中国土地上，形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金融网。这些外国银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一方面，他们为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输入和掠夺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提供资金和汇兑的方便，并通过外汇、金银的投机买卖，剥削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它们也利用中国原有的金融机构，为外国资本家服务，并开始对清政府进行小量的贷款，成为外国银行控制清政府的财政、金融的契机。总之，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与国内金融市场，并通过由小到大的贷款(仅铁路借款就28项，如芦汉铁路借款、湖广铁路借款等)，逐渐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成为他们对另实行经济侵略，加紧资本输出，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重要手段。

总之，当时中国金融的轮廓主要是由从1845年起就侵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和本国的钱庄、票号这三部分组成；从活动的范围来看，主要是这三种从事金融活动的专门机构并存的格局；从金融势力来看，则是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居主导地位，钱庄固然受制于外国银行，票号不象钱庄那样依赖外国银行，但也无法独立运行，更无从与外国银行在华势相抗衡，甚至于在某些业务方面还不得不仰仗外国银行的鼻息。中国金融的命脉主要被外国银行所主宰。洋务运动中的要人对这三种金融机构的联系和关系是众多的，这是日后洋务运动扶持兴办银行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晚清政府从洋务运动到兴办近代银行

面对外国银行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这样的局面，经营银行的优厚利润，以及这些外国银行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所施加的金融压力，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意图。加之，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近代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旧有的金融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而且社会货币资本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于是中国银行业的兴起就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中国通商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国人产生自己创办银行的主张，到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期间经历了数十年，但都未能得以实现。数十年间我国各方面的人士曾先后提出了国人自办银行的主张，其中有进步的经济思想家，如魏源；有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如洪仁玕(其《资政新篇》中已有“兴银行”之论述)；还有洋务派、改良主义者，如李鸿章等，新兴工商业者的代表人物如郑观应、汪穰卿和唐景星(其与巡抚丁雨生)等也提出了国人自办银行的设想。

尽管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1897年)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以1895年的签订的《马关条约》标志其破产)，但是从历史脉络看，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同洋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洋务运动遗留下来的产物，是洋务运动的“遗腹子”。晚清政府创立的这家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比最早进入我国上海的外国银行丽如银行姗姗来迟52年，但这毕竟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从筹备到成立，充满着矛盾和艰辛，是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浓重的一笔。从洋务运动到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百年史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的鲜明反映。因而，要谈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就不能不提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是晚清政府不甘沉沦而发动的“自强”运动，它对中

国近代工商业及金融业的发生、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于统治的需要，晚清政府不能不支持洋务运动这一唯一能使其不亡的事业，因而洋务运动虽遭遇顽固派的抨击和围攻却从未中断（甚至在洋务运动失败后仍有影响），洋务派虽极受攻击，然却终居要职。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由于外患的日渐加深，晚清政府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从扶持近代工商企业的发展到兴办银行业，无不体现着加强其统治的用心，其立场和着眼点仍是维护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上的农耕生产体系。不可否认，正是晚清政府的这些用意，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正是因为洋务运动中扶持起来的工商企业，或者说官办企业的成长，为日后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奠定了在资金、人事、管理、外交等方面一定的基础。

我们不能否认洋务运动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具有的一定的进步思想，在创立近代中国首家银行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洋务运动的首脑李鸿章提出拟设官办银行的节略是在1885年，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时期。他在叙述了办银行的必要理由、奏请清政府设立银行之后，还附呈了英国人克锡格和密克两人所拟的章程和计划。其后还有美国的米建威与李鸿章合办银行的意图，但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原因，终未实现。

从近代中国银行的创立过程看，银行创始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洋务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的赏识和扶持，除了曾、李、左外，还有张之洞、王文韶等，特别是李鸿章，并在各方面给以这些银行业开创者以支持，出于感恩戴德，这些人自然秉承洋务派的意旨而行事，有些甚至是俯首是瞻，他们同洋务派要人之间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成为洋务运动中的又一重要派别。这里仅举马建忠和盛宣怀为例。

马建忠是李鸿章的得力幕僚之一，他曾积极参与上述米建威筹设在华的华美银行的计划。在当时，虽然洋务派还不能马上筹建自己的银行，但他们已经有附股于外国在华银行的活动。马建忠投资到英商大东汇通和中华汇理银行两家银行，并担任前者的上海委员会委员和后者的上海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至于李鸿章本人是否也有类似的附股活动，或者说通过马建忠等加入一部分股份，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李鸿章同近代银行业的先驱马建忠关系甚密，洋务运动中的一些要人筹划兴办银行的行动早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已经开始了。

再看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始人盛宣怀同李鸿章的关系。盛宣怀是江苏武进人，其父曾任安徽庐州府知府，而庐州是李鸿章的故乡，所以从父辈起两家就有了交谊。正是由于盛宣怀和李鸿章的世交关系，加上盛宣怀的能力、胆识，因故在其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李氏的鼎力扶持。1870年盛宣怀在李鸿章处当幕僚，1879年任天津海关道，那时正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洋务运动，盛宣怀就成为其得力的助手并在以后步步高升，由盛宣怀直接管理或接办李氏所经营的企业，如李鸿章兴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比较重要的企业。1896年盛宣怀经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北洋大臣王文韶的保举，担任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而汉阳铁厂同时也归盛宣怀接办，所以盛宣怀在筹设中国通商银行时，已经是集全国轮、路、邮、电、工、矿企业的管理大权于一身的要人了。这些企业对于资金的融通与支持，无疑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没有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众多近代工商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近代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李鸿章在90年代后期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加入的股份，也没有自己立户，而是附在盛宣怀名下的“隐名合伙”，可见李鸿章同盛宣怀关系实非一般之密切。

洋务运动的要人想办银行的迫切心情跃然于纸，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兴办银行的重要性，如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期间曾经强调：“他族视中国强弱者，以学堂、矿务、铁路、银行为根本，船坚炮利犹其次也”。盛宣怀在给清廷的奏议中对开办银行的主要理由是强调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可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这在外患日渐加深的晚清政府统治时期，面对摇摇欲坠的清朝基业，晚清政府自然不得不应允了，便逐步转向支持兴办银行的行动。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基于财政需要，也想兴办银行，于是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便提上议事日程了。然而，中国通商银行从筹备到成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处处充满了困难和曲折。

三、晚清政府在内外夹攻下草创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从筹备到成立，充满着矛盾和曲折，它是在清王朝内部统治集团倾

轧争吵、极端守旧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和各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下，几经波折而成立的。

国人要办第一家银行的消息传到帝国主义分子那里，感觉到要损害其在华利益，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妄图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先后有英、俄、美、法、奥等国进行阻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卑劣手法，极尽其能，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第一个插手此事的是英国人赫德，盛宣怀深知赫德有海关在手，华商易被其笼络，于是一再向清政府有关方面联系催洽，并反复强调：“闻赫德觊觎银行，此事稍纵即逝”，并利用之要求晚清政府早日批准通商银行之开办。紧随英国其后的是帝俄。华俄道胜银行是帝俄在日俄战争期间为同日本争夺东北权益在1895年而设立的银行，晚清政府为借帝俄力量来钳制日本势力，因而加紧其在华的业务扩充，欲将其华俄道胜银行办成华俄合办的银行，竭力阻挠中国自办银行。其时美国尚未在华设立银行，因而密切关注中国人开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一成立，美国驻华公使就将其详情报告美国政府。当中国通商银行在北京设行时，竟有由美国人担任洋大班的拟议。其它还有法、奥两国，它们公然向盛宣怀、清政府提出归并合办的无理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用更卑劣的手段去加以破坏，用伪造的通商银行钞票阴谋破坏银行信誉，企图搞垮中国通商银行。

在遭遇外国银行干预的同时，还遭到了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当时晚清政府虽然也想利用新式银行来扩大钞票和公债的发行，并从银行的铸币和营业利润中分享利润，但同时又担心新式企业的增长，会使汉族官员手握大权，因此晚清政府对兴办银行的态度是摇摆的，是暧昧的，随着其统治的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而变化，清政府仅把这些兴办银行的人看作是前进道路上的同路者，而非同盟军，更非同志。这一点同盛宣怀在同两方面反对或牵制他的人展开的论战和进行的钩心斗角的争夺中看得极其明显。

坚决反对办银行的主要是总理衙门中极端守旧的顽固派。他们公开认为开设银行会造成混乱，有动摇“国本”之虞，因而不是公开反对，就是多方刁难。这些指责和刁难集中体现在诸如利益的分配、总行所在地、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以及领导权等方面。商人原来就怕银行办起来后被政府勒索，不敢投资，这一驳诘的内容外传后，中国通商银行的招股工作大受影响，正拟入股的犹豫徘徊；已入股的也想撤回。面对这样的情况，盛宣怀采取了迂回的斗争策略，为了挽回颓势，盛宣怀一方面托利用当时的政界要人如李鸿章、翁同龢（当时的户部尚书）、王文韶（当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支持并从中加以疏通；另一方面欲擒故纵，走以退为进的手法，以从此不管银行事为要挟。结果总理衙门的顽固派联名写信解释劝慰，表示对章程内容的修改并不坚持。接着，晚清政府也表示“中国不自行举办，一任外国在内地开设，攘我利权亦非和策”。终于勉强地允许通商银行按原定的日期开业。

然而，正当开幕之前，御史管廷献具上“官设银行，流弊宜防”的奏折，晚清政府又犹豫起来了。究竟利弊如何，要王文韶、张之洞两人；加以复议。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怕通商银行铸造银币对他的湖北铸币局不利，就对盛宣怀大加牵制。他说盛宣怀“若再督理银行必致群议蜂起”为由预以推卸。在和王文韶复议银行得失利弊时，张又推说情况不悉，对章程无研究，不敢轻易草率复议。后来还是王文韶向张说情，指出外人窥伺在旁，时机紧急，刻不容缓，不能再延误；盛宣怀也向他赔了不是，张才同意列名具复。

晚清政府内部统治集团倾轧争吵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觊觎下，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5月27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正式开业。这番苦争，并没有使盛宣怀得到银行督办的名义，仅是获得了“奉特旨办银行”的“皇命”。

四、晚清政府经营通商银行的失败及其评述

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是近代中国信贷事业的开始，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不论在资本经营还是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因此，中国通商银行避免不了其失败的悲惨命运，从其成立起就陷入了腐败、落后、亏损、萎缩的泥沼而欲拔愈深。晚清政府对于其的态度摇摆不定，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和扶持新兴的银行业这两股势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先天的不足”的缺陷，决定了中国通商银行始终未能办成一家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现代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管理人员不是先进的银行管理者，而是以洋务运

动为主的封建势力，这些都决定了其失败之必然性。张之洞曾评论这家银行是“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反映。

首先，晚清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晚清政府对于创立中国近代首家银行的态度暧昧，这是影响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要因。晚清政府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和扶持新兴的银行业这两股势力之间摇摆不定，寻求平衡。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英法联军之役所造成“内忧外患”的形势促使清朝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分化，出现革新势力，从而推动清王朝结束闭关自守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由此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革新与守旧的矛盾和斗争，并深刻地影响到晚清政府的政治结局。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实行变革，逐步实现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唯一发展方向，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政策，竭力将自己孤立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对世界发展茫然无知，成为中国实现近代化的主要障碍。于是，晚清政府对创立中国近代首家银行的态度随着其统治的强弱、安危而变化，是出于巩固其统治、出于内忧外患的恐惧而进行的。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国内斗争风起云涌，晚清中央政府的权力出现了下移的倾向，这使其无法动员全国的力量全面推动洋务运动的开展，自然也无法全力顾及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问题。晚清政府对于创办现代银行缺乏深刻的思索，完全是以外患的严重程度为转移的，中国通商银行是在内外夹攻下草草创立的，显然缺乏一种深刻的政治、社会、法律、经济等背景的。

同时，清政府对于满汉力量对比的担心也是使近代银行在兴办过程中持续争论、舌战，贻误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从本质上看争论不过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的争执，但由于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占统治地位并享有特权的满洲贵族受到削弱，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加强，这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数十年的晚清政府。汉人政治地位提高不能不引起素享特权的满洲贵族的歧视。所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西太后即开始奉行剥夺汉人督抚和湘淮将帅权力的政策。这种情况的发展都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进程。

其次，晚清政府的决策者的腐败无能，客观上阻止了建立近代银行的进程。除了晚清政府的腐败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晚清政府统治政策的最后裁决者的西太后，擅长在宫廷中行使阴谋诡计、独掌国权，前后统治达47年（从1862年——1908年），即同治皇帝的13年（1862年——1874年）和光绪皇帝的34年（1875年——1908年），这47年间正是中国通商银行从酝酿（19世纪60年代）到创立（1897年）的关键时期。慈禧太后是顽固地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的代表，她尽可能地坚决拒绝任何危害其统治的新事物，同时她也善于适应日益严重的国内外的对其不利的因素并改变自己的某些统治形式和政策。确切地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晚清政府唯一理解的东西是权力而非政治，他们对新事物所具有的反应能力，是靠经验、感觉和好恶，而不是理论学说的支配，没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管理国家的方案，自然也无法去制定和调整其统治政策。这种状态决定了晚清政府必然走向灭亡、中国通商银行不可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再次，晚清政府在财政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分散的财政、金融局面对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近代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太平天国的发生，使得晚清政府的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系户部派出机构，代户部分掌一省财政，各省盐运道、粮储道、税关监督也是户部的分支。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部库藩库藏帑殆尽，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晚清政府责成督抚筹款上解的办法，形成了以省为单位，包括藩、运、粮并和其他财政局所的地方财政系统。各省自立收支科目和标准，自立财政、税收和金融机构，中央集权的存留库款，地方督抚可以支配。户部与其后改称之度支部，财政收支遂不及各省。这种局面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金融方面的动作，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的银行发展前景是可想的。

第四，经营管理上的不善。这不论是从资本总额的筹措，还是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明显地可看出其管理上的落后和腐败。在中国通商银行的股份中，除了由盛宣怀操纵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名为官督商办，实为官僚投资）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外，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李鸿章及其他大官僚的投资达到73万两，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银行总董中的张振勋和严信厚分别认股10万两和5万两，按照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的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即250万两，上述已达到近200万

两，接近总股本的八成。其它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盛宣怀的初衷原本是要将中国通商银行归商人办，不要官商合办，但鉴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吵，不得不考虑招收官股以免被人视为垄断。在组织管理制度方面，名为商办，却是奉特旨设立；说是“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却是由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独揽大权，总行的九个总董，皆由盛宣怀个人指派，而非股东选举产生。中国通商银行在成立后的三年中，先后在十多个地方设立了分行，可是这些分行的分董或经理，不是各地的候补道员，就是豪绅、通职官僚等人物，这些人把银行视为衙门，官气十足，陋习特深，因而弊窦丛生，呆帐日益严重，行款损失严重，于是又将先前设立的分支行纷纷撤销，而到1905年仅五年左右的时间，只剩余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第五，外国银行势力的盘剥。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自然也包括金融业在内。由于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界已达四十年之久，它们依靠帝国主义特权，在中国广大的城乡遍设分支机构，资力雄厚，中国银行自然无法与之竞争。如前所述，中国通商银行在创办时遇到各帝国主义的阻挠，在创办之后，更是遭受帝国主义银行的制约和排挤，其经营业务困难重重，进展不畅。因此，中国通商银行的主要活动在于向政府取得垄断特权和充当外国资本的代理人，虽然这些活动多数并未有结果，但盛宣怀企图使“官帑、商股、洋债”三者结合起来的活动并未停止，后来曾代李鸿章向英、美帝国主义接洽借款就是一例。事实上，中国通商银行的内部规章制度完全仿照英商汇丰银行的章程来拟定，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西人为大班，掌握经营业务上的实权。如通商银行总行第一任洋大班即由曾在汇丰银行任职的英国人美德伦担任，除一切存款、放款、资金运用、押品处理、签订合同和选用职员等等之外，甚至于连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也要经他签字方能生效。可见，晚清政府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成立之初并无金融主权可言。

尽管中国通商银行“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但是无论如何，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开创了近代金融业的先河，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纵观中国近代史，从中国最早提出创办银行的主张到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 1859年在他所著的《资政新篇》中曾提出了“兴银行”的主张，认为“此事大利于商贾士民”（这个建议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等原因而未能实现）。此后，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的几年间，先后又有数家银行成立，其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北京设立了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除办理一般银行业务外，由清政府授予铸造货币、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经理公债等特权，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30多处，成为清朝末年起国家银行作用的一家银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出一部分资本并招商入股，在北京成立了交通银行，这家银行除经办轮船、铁路、电报和邮政系统所属单位的存放款与汇兑业务外，也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并发行银行兑换券。与此同时，由民族资本开办的信成商业储蓄银行、信义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也于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1906年至1908年）相继成立。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发展成为一家相当实力的大银行，也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诚然，如果中国通商银行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特点；如果中国通商银行没有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影响和外国列强的阻挠、破坏；如果中国通商银行自身不是组织散漫、管理落后、业务混乱等等，我们今天对于中国通商银行的评价会高很多。但这只是后人的要求、希望，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前人没有做到的事，而对他们做到的事不加承认、认可；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前人做到了某些事，而对其未能达到的事、做得不好的事而不表示遗憾、谴责。我们只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其历史分析和结论才能客观公正，避免偏颇，对于中国近代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评价亦当如此。

参考资料：

- 1、洪葭管《清末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 2、孔祥毅《中国资本主义银行业的产生》
-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 祁敬宇，男，汉族，经济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首经贸北路8号院万年花城一号楼一单元601房间

邮政编码：100070

电话：010—81914735

手机号码：135204877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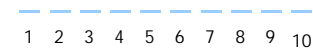
E-mail: nihao791@163.com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	----------------------	----------------------	--------------------------	----------------------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最新评论 (共有 1 条评论)	发表时间	作者	回复
纳闷中……	2007-01-15 18:42 pm	tsiangwang	0
更多评论...			